

大学多样化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 互动图景、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陈亮,刘艺璇,王彦凯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大学多样化发展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本质上是以可持续创新生态系统为价值内核的“空间-功能-情感”三维重构过程,二者植根于知识生产、资源循环与价值共创形成的共生耦合关系;依托大学、城市与青年的交互形成职业能力、城市认同、创新浓度与文化温度的四维螺旋递进体系,在场域文化的黏合作用下形成知识枢纽、创新枢纽与人才枢纽的城校互动图景。在社会急剧变革时代,大学多样化发展与青年发展型城市之间的双向互动面临人口流失危机、文凭学历崇拜、资源共享壁垒与城市转型乏力等现实冲击,亟须以“大学-青年-城市”高质量互动来应对未来挑战。大学多样化发展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需基于青年友好型生态构建人与城市共生机制,依托政产学研协同推动高校与城市共融,面向青年创新创业需求推动城市资源共享,并以多元包容的评价体系激发社会共鸣。

关键词:大学多样化发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城校共生;产教融合;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25)05-0055-16

在当今时代,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已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与战略方向。青年作为社会中最具活力、创造力与创新精神的群体,其成长与发展状况直接关乎城市的未来走向。一座能够吸引、培育并留住青年人才的城市,必将在科技革新、文化繁荣、经济增长等诸多领域获得持续动力,进而在全球城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稳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2022年,中央宣传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明确了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内涵理念,即“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与城市创新创造活力相互激荡、青年高质量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的城市发展方式”。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强调“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此背景下,教育强国建设不仅能够推动教育的“强”,更能以教育“自身强”推动“国家强”“城市强”“青年强”^[1]。其中,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强国的龙头,大学多样化发展恰能为青年与城市间的良性互动搭建桥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向2030年的高等教育新愿景》等报告均强调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一定意义上而言,大学多样化发展是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中,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必定是一幅多元化大学与城市共鸣共振、共生共荣的多态性图景,包容不同知识、思想、观点的碰撞交融和有组织创新。

大学依托城市作为高等教育枢纽的承载主

收稿日期: 2025-05-04

修回日期: 2025-07-07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科基金专项项目(2025SZ05);陕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专项资助(ZBXM2025006);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GERP-24-09)

作者简介: 陈亮,教授、博导,从事高等教育政策、区域高等教育研究。

网络出版时间: 2025-07-21

网络出版地址: <https://link.cnki.net/urlid/32.1774.G4.20250721.0858.001>

体,其多样化发展既是高等教育体系的关键特质,又成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智慧库”,能够促进知识枢纽、创新枢纽、人才枢纽的有机协同,深度塑造城市的发展格局与文化生态。目前,学界对大学多样化发展和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及其关联的多维探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聚焦我国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构建,基于青年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义对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理论内涵进行探讨,并从多主体、多角度探寻城市建设路径^[2-3]。二是关注大学多样化发展,从含义阐释、分类体系构建、现实困境分析等层面展开研究,同时分析数智时代大学多样化发展的行动路径^[4-7]。三是将校城互动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对国内外的典型城市进行案例分析,探究大学与城市的共生关系及其互动发展路径^[8-9]。然而,现有研究缺少对两个主题间耦合关系的分析,未能对如何有效突破区域壁垒、化解人口结构困境以及调和学历与能力的需求矛盾等现实难题作出有效回应。基于此,文章试图揭示大学多样化发展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互动图景,并针对现存挑战探究实然层面的优化路径,希冀为达成青年优先发展理念共识、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大学多样化发展维度的方法论支撑和实践智慧。

一、大学多样化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耦合关系

大学多样化发展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协同并进的动力机制植根于知识生产、资源循环与价值共创的共生逻辑:大学作为知识创新的策源地,通过多样化发展释放差异化资源与服务;城市作为青年发展载体,以需求导向的空间生产反哺大学的价值实现。根据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中物质性、社会性与精神性的嵌套结构,多样化大学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共生的本质是以可持续创新生态系统为价值内核的“空间-功能-情感”三维重构过程,即校城之间存在三重递进的耦合关系,分别是现实物理空间融合的空间耦合关系、大学

服务与城市发展需求相适配的功能耦合关系、校城发展与青年成长形成价值共鸣的情感耦合关系。当大学的多样化供给与城市的青年发展需求依次在空间、功能、情感维度形成共振时,可持续创新生态便从理论构想转化为实践图景。

(一) 空间耦合: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与多样化大学的物理融合

大学与城市的物理空间融合是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物质基础,即通过空间邻近性、共享性与开放性的三重维度,构建支撑青年发展的基础性物质载体。这种物理融合既是对传统校城割裂状态的突破,也是应对青年人口比重呈L型趋势变化与城市年龄结构快速分化,进而形成更加合理的教育人力资本分布结构的必然选择^[10]。物理空间不仅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显性物化层面的连接是知识交汇、文化交融的前提和基础^[11]。大学通过激发校园设施的公共服务功能,将封闭的知识生产空间转化为开放的城市创新基础设施;城市通过土地混合利用、交通网络优化等政策工具,反哺大学。在这样的过程中,大学的多样化发展形态(如研究型大学、应用型高校、社区学院)通过差异化的空间供给策略,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共荣互补,形成多态适配的空间治理模式,并最终形成青年、多样化大学与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共生闭环。

地理空间的邻近性是物理融合的起点。多样化大学通过开放式校园设计、交通网络嵌套等策略,与城市形成“点-轴-网”的拓扑关联,压缩青年学习、生活与就业的物理距离,例如深圳大学城依托地铁站点串联高校、科技园与青年社区。这种空间压缩通过缩短知识传递的物理半径,提高了创新链条的运转效率。同时,功能混合的土地利用模式使校园科研空间、城市产业空间与青年生活空间形成立体叠加。在邻近性基础上,空间共享性放大了物理融合的价值。多样化大学通过图书馆、实验室、体育场馆等设施的开放,推动校园向知识密集型公共空间转型。本质而言,大学的高密度知识资源与城市的社会服务需求在物理空间上交汇,打破了传统校园的物

理边界,使大学的“围墙”变为“渗透膜”,既保护了教学科研的核心功能,又通过可控的开放机制实现资源外溢。更深层的物理融合则体现在空间开放性对青年机会结构的重塑上。青年发展型城市通过政策工具激励多样化大学释放存量空间,将其转化为低成本、高包容的青年发展载体,例如青岛西海岸新区引入高校时,形成“大学即城市创新基础设施”的认知重构。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定义的,社会资源以正义的方式实现公正的地理分配^[12]。物理空间的开放性正是青年发展型城市空间正义性的具象化表达。

物理空间的融合始终围绕如何通过空间重构将大学的知识资本转化为城市的发展资本这一主题展开。这不仅是物质形态的整合,更是空间生产逻辑的变革。当校园与城市的物理边界逐渐消解时,青年得以在更广阔的校城融合体中实现自我价值,而城市也因青年的创新活力获得持续发展的动能。

(二) 功能耦合:大学多元化服务溢出与青年发展型城市的供需匹配

功能耦合的实践价值在于通过教育、创新、文化的协同作用,将多样化大学的服务能力转化为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发展增量,实现知识外溢与资源反哺的双向强化。其独特性集中体现为需求导向的动态适配机制通过精准匹配大学的多样化服务能力与青年发展型城市的需求,使知识资本向经济资本高效转化。在此过程中,青年成为大学服务供给的核心对象和城市价值转化的关键枢纽。

第一,教育功能与人力资本的精准适配。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指出,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基于这一政策导向,大学多样化定位宜紧密对接城市产业体系的分层需求,达成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垂直耦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在于通过创新来推动高质量发展^[13]。在此背景下,研究型大学凭借基础学科优势培养青年科研人才,为城市原始创新提供智力支撑。应用型高校通

过产教融合向地方产业输送技术技能型青年劳动力,如苏州工业园区引入西交利物浦大学等高校、东莞理工学院与华为共建ICT学院,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人才供给网络。此外,社区学院通过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增强在岗青年的职业韧性。这种分层供给模式能够避免教育层级错配导致的资源浪费,并通过教育链和产业链的嵌套关系,减少青年职业发展的制度性摩擦,实现人力资本的结构性适配。

第二,创新功能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共进。该协同本质上是大学与城市构建“知识溢出-技术转化-市场反馈”链式耦合的过程。大学作为创新策源地,需要摒弃缺乏互动机制的线性转化模式,通过非线性的跨学科实验室、产学研联合体等网络化机制,突破传统单向链条的局限,将科研服务功能与城市产业转型紧密相连,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发展空间。具体而言,大学依托概念验证平台、技术转移中心、成果应用迁移创新中心等载体,筛选具有市场化潜力的青年科研成果,将青年科研人员的知识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凸显大学服务产业变革的“知识型经济皇冠上的明珠”地位;城市通过科技园区、中试基地等空间载体,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规模化生产验证场景,并建立企业与大学的专利共享、利润分成机制,逐步建立科学合理、优势互补的“产、学、研、转、创、用”新模式^[14]。

第三,文化功能与公共服务的资源融合。大学的开放性文化服务通过与城市公共文化体系的深度互嵌,将学术资源转化为普惠性公共产品,在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的同时,以文创开发、知识服务的市场化路径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生增值。这种融合既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效能评估与价值反哺机制确保资源转化的可持续性,更能催动青年文化实践与城市活力再生的良性循环。如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将象山校区艺术工坊向市民开放,并定期举办城市美学工作坊,既为青年艺术家提供了社会实践平台,又弥补了公共文化服务中专业美育资源短缺的短板。这些实践突破了资源共享的表层逻辑,体现了大学文化空间作为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的延伸,能够

通过标准化服务协议保障教学科研核心功能以及通过可量化评估体系衡量服务效能,并通过收益分成机制实现文化资本的螺旋增值。于此,青年既是文化服务的生产者,也成为转化媒介,其创意实践将学术符号解码为大众可消费的文化产品,在提升城市文化品质的同时,也为自身职业发展积累了资本,更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提供了资源可共享、效能可量化、价值可循环的文化治理范式。

(三) 情感耦合:多样化校城支持体系与青年的“情感在场”

情感耦合聚焦多样化大学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在社群网络和情感纽带层面的隐性协同,超越了空间联结的物理性与功能匹配的工具性。其核心在于通过大学与城市的制度协同和文化互动,构建青年群体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价值共生关系。青年唯有在制度保障中看到发展希望,在社群互动中积累关系资本,在文化共鸣中确认身份认同,才能真正增强对城市的心理归属感和共同体参与感。

在原子化特征日益凸显的现代社会中,青年常以孤立的个体状态存在,缺乏稳定的社会关系。多样形态的大学凭借其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将不同背景、专业的青年汇聚一堂,青年发展型城市则通过极具包容性的制度设计,为青年提供发展空间。二者相互配合,形成多样化校城支持体系,推动青年从孤立个体转变为相互关联、彼此协作的网络化主体。这不仅能有效破解青年群体在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悬浮感”,让其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更通过社会关系再生产凝聚城市精神,成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实现青年群体从“物理在场”向“情感在场”的跨越。

青年对城市的情感疏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户籍壁垒和住房压力以及身份认同缺失导致的文化区隔,从管理需求转向培育认同的制度创新能将政策工具转化为情感纽带,可感知的权益设计也使青年在参与中自然产生对城市的归属感。其一是住房政策的弹性适配。杭州市构建“青荷驿站-人才公寓-共有产权房”三级体系以匹配青年全生命周期需求,通过渐进式融入缓解青年定

居焦虑,使其感受到制度对个体发展的尊重。其二是文化治理的普惠转向。成都推出诸多项目突破单向文化供给模式,将青年从文化消费者转变为城市文化共建者,使其与城市的精神联结不再流于表层,而是在共建共治的文化生产中产生真正的情感黏性。

大学作为多元群体的集聚地,能够将组织动能转化为城市治理资源,通过跨校、跨城社群活动打破青年社交的心理边界;城市通过政策支持降低关系构建成本,共同破解原子化社会的信任危机。其一是兴趣社群的协同培育。深圳通过高校、政府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平台,依托高校技术资源与城市产业场景,定期举办跨界沙龙、创业赛事活动,形成多元融合的青年社交网络,使青年在职业发展中获得持续支持。其二是代际互助的社群实践。济南、杭州等地的多所大学与社区合作开展教育服务项目,组织青年志愿者参与社区老年教育,通过知识交换增强代际互动,既能帮助青年积累社会资源,也能为老年群体提供创造社会价值的机会,从而形成跨年龄层的情感联结,实现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

大学的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本可催生更深层次的情感耦合。部分大学通过校园开放活动或与城市联动的文化庆典,将学术资源转化为公共文化体验,增强青年与市民的身份认同。此外,大学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社区治理平台,为青年提供应急支持和职业培训等公共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大学转型成为情感的调节器,不仅将青年毕业生升格为城市精神代言人,加强情感共鸣,又将情感理性化,将个体焦虑转化为公共议题,重建青年与城市在理性讨论中的信任契约。

二、大学多样化赋能青年发展型 城市建设的互动图景

加拿大学者简·奈特(Jane Knight)提出的高等教育枢纽理论,深刻揭示了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该理论将“高等教育枢纽”概括为“有计划的努力”,强调某一国家、地区或城市为实现既定发展目标,汇聚本地

和国际教育活动各主体,使其战略性地参与教育、培训、知识生产和创新活动,具体包括学生枢纽、人才枢纽以及知识和创新枢纽三种类型^[15]。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多样化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枢纽的核心承载主体,在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扮演着知识枢纽、创新枢纽与人才枢纽等多重角色。随着城市和青年的发展需求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大学的各个枢纽功能在互动交融中逐步拓展为动态的协同网络:知识为城市创新、技术突破和制度变革提供理论基础;创新是知识应用的实践,驱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人才作为知识与创新的主体,是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生命线。与此同时,文化作为一种隐性力量,悄然渗透于校城间的知识协同、创新协同、人才协同中,成为维系三种协同的隐性黏合剂,通过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重塑青年与城市的精神契约。由此,大学多样化发展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形成一个知识生产、创新转化、人才培育和文化浸润的协同过程,能输出构成螺旋递进协同体系的四维成果,即个体层面的职业能力和城市认同,城市层面的创新浓度和文化温度(见图1)。基于递进的显性脉络和浸润共生的隐性支撑,四方面协同构建起大学与城市间赋能和反哺的双向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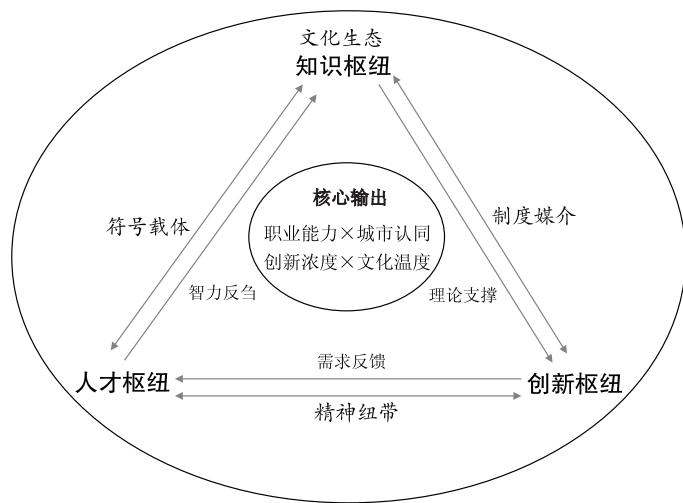


图1 大学多样化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互动图景

(一) 知识协同:多元知识生产转化共筑青年发展型城市开放和包容理念

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知识生产与转化,可以为城市的技术突破和制度创新铺就道路,进而激发城市活力与文化多样性,促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形成开放和包容的发展理念。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依赖知识溢出效应(Knowledge Spillover)和网络化创新(Networked Innovation)^[16],基础学科的前沿突破通过产业化应用催生新质生产力,社会科学的韧性城市等理论创新为政策设计提供思想资源。借此,多样化大学产出的多元知识经由传播与转化的链条延伸,为城市的开放包容理念提供内生动力,激发城市和青年群体的创新活力。开放包容的城市建设理

念和环境又进一步吸引青年参与知识生产,提高其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和对城市建设的归属感。在这一过程中,青年群体处在知识流动的核心地位,从被动接受者转化为知识共创的能动主体,最终实现青年与城市双向互动的动态循环以及共同成长。

多样化大学正从单向知识输出者转型为多元知识网络的“催化节点”,能够实现知识生产、传播与转化的高效流动。这种流动不仅推动了知识网络的发展,更将青年人才的创造活力融入城市发展进程,形塑多元共治理念和创新共生模式。如何更好运用现代科学知识促进自身发展,是青年发展型城市面临的关键命题。城市本土局域的知识多元生产和知识转化运用成为通常意义上的必需能力。在知识生产层面,多样化大

学打破学科壁垒,能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建立交叉学科平台,以城市痛点为导向进行多学科协同攻关,更能纳入新兴主体实现开放式的知识共创,构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分布式创新网络,使学术研究的知识产出嵌入城市发展需求。通过跨学科、跨主体、跨场景的多元知识转化,多样化大学推动知识从学术高地向城市公共领域渗透。由此,青年发展型城市真正成为共治共生和制度开放的代名词以及青年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机体。

(二) 创新协同:创新街区集群合作开拓青年发展型城市发展新途径

传统城市创新模式常以碎片化的资源配置和线性思维为主导,这种线性发展模式既阻断了跨领域知识的流动与协作网络的形成,又导致创新要素的重复投入与效能损耗,难以发挥区域内规模化的协同效应。随着大学分类管理、分类评价的逐步推进,多样化大学的集群合作优势开始凸显,这既能形成差异化创新供给,又能避免过去实践中指标陷阱的同质化竞争。因此,搭建包含多样化大学在内的创新街区成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新路径。创新街区通过构建多主体协同的集群合作网络,整合创新资源并推动城市区域发展。集群合作是指不同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形成网络化协作关系,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联合行动,推动创新要素的集聚与转化,并构建创新街区,最终实质拓展涵盖创新链、产业链、城市功能等多维交叉融合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发展范式。多样化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节点,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形成“蜂窝式网络协作”关系,各主体深度绑定共建创新生态,并对创新街区有深度的根植性。“这种根植性从密切的社会互动、机构建立的信任和受到鼓励的行动主体间的非正式关系中获得支撑”^[17],也即创新街区的空间设计为集群合作提供知识共享和非正式协作的场所,能够增进多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青年发展型城市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整合、城市功能与青年需求的响应等新型融合生态是创新街区集群合作的具体表现。在现今的风险社会,成功的集群合作需要平衡市场活力和制度保障间的关系,同时依托文化认同形成可持续的协

作生态。这样的集群合作通过物理空间共享、知识流动和政策协同,能显著降低企业研发和交易成本,分散多主体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风险。创新街区内的集群合作通过混合功能的空间设计打破传统分区模式,重构城市空间结构,为青年提供低成本的创业载体和适宜社交场景,更加强化了多主体协同,进而推动创新要素的链式聚合,最终实现城市价值提升与资源配置优化。综上,物理空间的紧凑性和社会空间的根植性共同构成创新街区的驱动引擎,通过多主体协同的集群合作,为青年发展型城市提供了兼具效率与韧性的的发展路径。

(三) 人才协同:职前职后适配贯通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生态

可持续发展生态理念重构了青年与城市的关系逻辑,其本质在于将人力资本的价值演进与城市系统的功能升级深度耦合,形成职前能力培育与职后价值转化的动态闭环^[18]。职前高等教育作为青年能力建构的初始界面,通过“知识-能力-价值”三维范式革新,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化为青年认知结构的深层基因。在知识维度,职前跨学科课程体系整合生态学、社会学与技术伦理,构建起“绿色技术开发-社会公平治理-全球风险应对”的复合知识框架。碳中和路径、循环经济模型等议题被嵌入职业课程,使青年在学术启蒙阶段即形成对城市复杂系统的理解力与责任感。在能力维度,职前教育基于系统动力学模拟、城市韧性设计沙盘等复杂性思维的训练模式,培养青年对非线性问题的诊断能力与协同创新能力,使其能够应对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等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挑战。在价值维度,职前社会责任教育从抽象理念转向具身体验,通过社区参与式学习、社会创新工坊等实践,让青年在解决垃圾分类、老旧社区改造等现实问题中完成伦理自觉的内化。三维范式本质上是将可持续发展从外部约束转化为青年认知的内生操作系统,为其终身参与城市建设提供能力储备。

当职后青年进入城市发展场域,其可持续竞争力的维系依赖于城市、政策与生态三个层面的动态支持与生态反哺。在城市层面,通过终身学

习基础设施的建构,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的虚拟实训平台,形成知识更新的“新陈代谢”机制,使青年能够实时对接产业技术迭代^[19]。在政策层面,可持续治理框架的完善体现为“人才成长账户”等制度创新,通过住房保障、健康管理、创业扶持等服务的精准供给,降低青年生存性焦虑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在生态层面,青年通过社区议事厅、文化共创计划等渠道,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化为城市治理实践,推动低碳社区建设、共享经济模式等创新探索。这种参与不仅激活青年的主体性价值,更使其成为城市文明演进的文化媒介。职前教育与职后支持的协同机制,既是青年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生成场域,也是城市创新生态的建构支点。二者的互动映射了知识资本、制度供给与空间生产的复杂交织,共同塑造青年发展型城市的韧性基底。

(四) 文化协同:鼓励探索宽容失败机制重塑青年发展型城市创新创业精神

文化协同的本质是青年发展型城市创新生态的基因重组,通过重构“成功-失败”的理论框架与制度逻辑,为青年发展注入持久的文化动能。在理论内核层面,社会学习理论揭示,创新能力的积累遵循“试错-迭代-跃迁”的非线性路径^[20],这一过程本质上是突破“成王败寇”的传统叙事框架,建立“探索即价值”的文化认同体系。传统绩效文化导向的评价体系通过KPI量化、成果可视化管理手段,将连续的创新过程切割为离散的绩效单元^[21],导致“失败经验”被排除在价值计量体系之外。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文化重构在于塑造了“过程价值捕获机制”,即将未竟项目的技术路线图转化为可复用的算法模块,将中断实验的数据遗产沉淀为开放数据库,将市场验证的负反馈信息抽象为决策树模型。这种价值捕获并非简单的经验存档,而是通过知识图谱技术建立失败要素与成功路径的关联网络,使青年看似断裂的探索轨迹转化为可追溯、可重组的知识资产。这种价值重估打破了“成果主义”的认知窠臼,使城市创新系统从成果收割机转型为过程孵化器。

在制度逻辑层面,宽容失败的协同机制需突

破“惩戒-激励”的二元对立,构建“风险共担-知识共享”的文化治理模式^[22]。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治理体现为三重制度文化创新。一是城市政策框架依靠“负面清单”划定创新自由区,明确除法律禁止事项外,其余探索性实践默认“法无禁止皆可为”。这实质上是将制度约束从“事前审批”转向“事后追责”,释放更大的试错文化空间。二是城市金融体系构建风险社会化分担机制,通过创新保险、风险补偿基金、共担型股权投资等工具,将个体承担的试错成本转化为社会分摊的创新投资。三是社会组织搭建经验沉淀平台,运用区块链技术对失败项目的技术模块、用户数据、管理经验进行脱敏处理,形成可溯源、可组合的创新要素库。这些制度创新的协同效应在于创造“制度冗余空间”,即允许存在非常规探索、暂时偏离主流轨道的缓冲地带。文化协同重构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创新基因,构建过程价值捕获机制与制度冗余空间,通过理论重塑和制度创新培育容错文化生态,推动创新范式向过程孵化转型。

三、大学多样化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现实挑战

多样化大学与青年发展型城市之间蕴含的空间、功能、情感三重耦合关系,以及基于高等教育枢纽理论勾勒出的校城互动图景,均为多样化大学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根本依循,为青年与城市的共荣共生提供了创新思路。然而,大学多样化发展与青年发展型城市之间的双向互动正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处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我们唯有充分重视并厘清大学多样化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现实挑战,方能有的放矢地探索优化路径,实现“人”“校”“城”三者高质量发展。

(一) 人口危机:青年流失与人口老龄化对城市活力的双重挤压

在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进程中,城市的人口结构对其创新活力与竞争力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持续老化,呈现少子化、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以青年流失和人口老龄化为具体表现的人口危机正在对城

市的创新发展活力造成双重挤压。整体上,我国青年人口规模及占总人口比例近年呈缩小和下降趋势,且出生率的持续降低使未来青年人口规模将维持萎缩趋势^[23]。在此基础上,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总体呈扩大和上升趋势,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高龄化趋势日益凸显^[24]。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变,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持续萎缩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对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刚性需求形成显著张力。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人口逐渐向东部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集聚,各城市基于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而展开的争抢优质青年劳动力的“人才大战”愈演愈烈。这进一步导致在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地理位置、教育环境、就业环境、人才激励政策等方面存在劣势的一些城市,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青年主动外流现象。更甚的是,部分一线城市由于生活成本高、竞争压力大等环境因素产生“人才挤出效应”,青年被动流出城市。

合理的青年人口规模是社会存续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更是城市发展和社会运行的关键动力。城市中青年群体的流失直接削减了城市发展所需的智力支持及青年人力资源和优质消费者的数量,不利于青年与城市创新创造活力的相互耦合。同时,青年流失使城市的老年人口占比大幅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新鲜血液供应不足,随之引发城市的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结构老化问题。这导致在城市养老服务方面,城市养老负担加重,城市在养老金支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领域面临巨大压力;在城市创新方面,城市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成本增加,制约企业在科技研发领域的投入,进而抑制城市创新能力^[25],延缓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进程。更为严峻的是,上述问题极易形成恶性循环,即青年发展型城市发展受阻,支持青年发展的力度减弱,大学培养的青年人才难以在本地城市找到合适的发展机会转而流向其他城市。这将进一步加剧城市的人口危机,成为大学多样化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掣肘。

(二) 文凭至上: 城市建设的学历崇拜强化文凭焦虑

就业是民生之本、青年发展之基。然而,当

前过度追求高学历或优质文凭的就业环境加剧了社会的文凭焦虑,严重阻碍了青年发展型城市在吸引青年、留住青年、助力青年有所作为等方面的步伐。文凭作为个体从学校中获得的文化产品,是一种“物质领域争夺地位的资源”^[26],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个体的能力和素质水平,因而长期以来被奉为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指标。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逐步加深,个体对文凭的狂热与迷信日益凸显,社会中“学历崇拜”“文凭至上”等多种文凭异化现象接踵而至。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管理部门更倾向于以“唯学历”与“唯名校”来引进青年人才,单以学历、文凭来衡量个人的能力与价值,而忽视了青年人才的发展潜力。甚至有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重视并追查应聘者的“第一学历”,将其作为一种筛选工具并据此进行差异化对待,个人的实际能力与综合素质被高考成绩和本科院校品牌严重遮蔽^[27]。

不可否认,人才高度决定城市高度,青年发展型城市的高质量建设的确需要优秀人才。但盲目崇拜文凭甚至将其作为衡量个体优秀与否的“灵丹妙药”,会使社会充斥着浓重的教育焦虑、文凭焦虑与就业焦虑氛围。受此矛盾张力的影响,文凭的通货膨胀愈发明显,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高等教育文凭变成一张使人迈入中产阶层的通行证。多样化大学的优势不再是对不同个体进行心智培养与理性启蒙,转而注重为个体提供高竞争力。与此同时,个体间的同质性竞争愈演愈烈,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中的青年,其身心健康受到侵蚀,扎根城市创业安居的意愿降低,更难以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因此,在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中,如何借助大学多样化发展为青年提供多元化、个性化成长路径和发展机会,有效化解城市建设与文凭焦虑之间的矛盾张力,已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

(三) 边界壁垒: 区域协同性不足限制城校资源共享

城校发展的“同频共振”既是驱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引擎,也是推动人、校、城三者

共生发展的关键纽带。当前,城校之间存在的边界壁垒未能完全消除,二者在知识、创新、人才和文化四方面协同联动的缺失进一步限制了资源互通共享。由于城市空间是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统一^[28],城校资源流动的壁垒实质上是二者之间存在的三重“空间隔离”,这无疑会削弱大学与青年发展型城市的互动效果。

具体而言,城校间成果转化效能不足引发知识与创新资源的物质空间隔离,人才供需失配加剧人才资源的社会空间隔离,价值观分歧造成文化资源的精神空间隔离。其一,创新链的前端基础研究与后端成果应用存在断裂,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过程中形成了物质空间隔离,这不仅弱化了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也制约着城市发展所需的知识、创新资源供给。目前,我国支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各类要素还未完善,城校间的知识协同与创新协同均存在断裂点。例如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机制不畅通、中介平台缺失;大学的科研评价与激励机制主要依据论文产量与科研项目立项,缺少对科研成果现实转化的重视^[29],导致其产出的多元知识多停留于纸上,研发的多领域创新成果被封闭在校园内,难以转化为服务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其二,以人才供需错配为主要表现的城校人才协同不足阻碍了二者在社会空间中的双向赋能,不仅削减了城市发展所需的人才资源,也严重挤压了青年的发展空间。从人才资源的供给侧来看,各类大学虽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结构,布局急需学科专业,但由于学科建设周期长、产业迭代升级速度快,大学的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往往不能及时响应新兴产业需求。同时,部分大学忽视自身定位与区域发展特色,盲目设置一些热门专业,培养出的人才与城市发展需求脱节,造成人才资源浪费。从人才资源的需求侧来看,当前产教协同育人机制尚不健全,校企合作多停留于浅层契约式层面,企业并未充分发挥其在预测人才需求、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精准指导大学育人方向等核心环节的主体作用,致使青年人才掌握的知识、技能与产业发展适配度偏低,无法有效服务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其三,城校发展的价值观差异直接阻滞了城校的文化协同。二者由于无法构建共生的精神空间,也就难以通过共享文化资源强化青年与城市之间的精神纽带。青年与城市绝非栖居与索取的简单关系,而是价值共创的共生体。杭州以开放包容、多元有活力的城市文化为青年逐梦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既满足了青年多样化、多层次的发展需求,更为城市转型升级注入活力,实现了青年与城市的双向奔赴。相比之下,多数城市过分注重效率和经济利益,与大学追求个体的批判性思维发展形成本质冲突。这种错位的价值取向不利于城校构建“让理想照进现实”的共生空间,青年人才既难以在学术理想中找到实践出口,也无法在城市发展巾获得价值认同,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随之弱化,不易将奋斗之力转化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之能。

(四) 过渡困顿:大学多样化支持助推城市发展转型的进程被延缓

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需要大学提供多元化的创新知识、差异化的青年人才以及精准化的社会服务。然而,当前大学在多样化发展过程中陷入“同质化”泥淖,知识、技术和人才的对外供给能力弱化,严重迟滞了其支撑和引领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进程^[30]。实际上,这一现象是大学发展目标与城市转型需求产生了错位,导致“大学所能”无法为“城市所需”提供有效的支持。

现阶段,我国在政府主导下,通过政策规定并赋予不同高校以不同的办学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和服务面向,共同组成高校分类体系^[31]。其中,许多大学为取得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出现“重身份,轻质量、轻内涵”的发展倾向。这些学校对标学术研究型大学,违背自身实际与发展需求而盲目攀高、效仿,以致在办学类型、层次定位、人才培养模式、学科专业设置等方面出现“形异质同”的现象。实施高等教育的最差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鸡蛋往一个篮子里装——高等教育最忌讳单一僵化的模式^[32]。大学多样化发展的目标本应以特色发展满足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多元需求,通过开设符合自身定位优势的专业课程,培养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然而,当大学

卷入同质化竞争时,功利化的发展目标将束缚大学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成为城市转型发展的关键限制因素。一是学科布局趋同削减了知识创新供给。一些大学为追求综合性办学定位,不断扩大学科覆盖面,扎堆或重复开设热门学科专业,缺乏对新兴交叉学科和区域特色学科发展的重视。当大学无法通过差异化定位形成特色学科集群时,将直接导致城市转型所需的知识和创新要素供给单一化,难以对城市痛点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二是培养模式趋同造成青年人才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在学术型教育模式的长期影响下,如今部分大学虽表面上被冠以“应用型”“技能型”标签,但仍延续着学术型大学的运行逻辑。在单一的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极易被边缘化,从而引发多元化的城市转型需求与均质化的人才规格之间的矛盾。由此,人才结构性失衡将使城市出现“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困境,即学术型人才供给过剩导致青年“有业难就”,技能型人才缺口又严重制约城市产业的转型升级。三是办学导向趋同可能会弱化科技成果的服务效能。受制于指标化、简单化的高校评价模式,大学科研活动过度追逐论文发表数量、科研成果数量等学术指标,而忽视了成果转化的重要性及其与城市需求的适配性。在大学普遍“重学术轻应用”的办学导向下,大量学术论文、技术成果因脱离城市实际应用场景而沦为“纸面创新”,致使青年发展型城市失去了核心技术支持与服务,迟滞了全域的创新建设进程。最终,同质化发展的大学将削弱城市转型所需的多类动能,压缩青年的多元化成长空间,造成“人-校-城”协同发展的链条断裂与进程延缓。

四、大学多样化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优化路径

大学多样化发展已成为联通人、校、城的关键枢纽,在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中充当着“发动机”角色。在大学多样化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进程中,如何基于二者的耦合关系与互动图景破解现实困境、优化实践路径,成为建设一座开放包容、活力迸发的青年发展型城市不得不

思考的问题。

(一) 人与城市共生:创新青年社区融入机制,构建城市友好型发展生态

第一,“强阵地”:校社共建支持青年参与社区、协作共治的“线上+线下”开放平台,为青年参与公共事务提供强有力的阵地支持。一方面,大学科研既是大学为社会发展与进步提供的最重要的价值,也是大学实现自我发展并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源^[33]。大学应发挥科研优势开发线上参政议政平台,以数字化赋能青年参与社会治理与社区服务。该平台可设置“问政”“议政”“理政”等模块,青年可对政务信息进行学习宣传,为社区改造与城市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另一方面,为吸引青年走出校门、深入社区,多样化大学可与邻近社区建立实体的异质性共治阵地,并组建以青年人群为主体的议事组织。社区要根据青年的行为特征,为其提供集学习、工作、活动等空间功能于一体的生活驿站。同时,社区应将过去单一的社群网络转为以年轻社群为核心的多中心社群网络,推动大学青年与社区其他各年龄人群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组建多元主体议事会,由各主体共同协商决策社区的相关事务^[34]。

第二,“强支持”:校社协同构建贯通青年职前职后发展的全周期支持机制,营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职前教育阶段,大学可采用“服务学习”的教学模式,将专业学习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从知识、能力、价值三个维度为青年社会化赋能。具体而言,多样化大学要围绕城市建设与社会工作的不同领域分类提供跨学科课程、模块化课程以及开展专题讲座,为青年参与社会治理奠定专业知识基础。同时,多样化大学要联合社区为青年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机会,让青年人才在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环境保护、养老服务、治安管理等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增强系统性思维与协同决策能力,形成扎根城市、服务社会的价值自觉。在职后阶段,社会需要为青年人才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例如政府在住房补贴、创业扶持、健康管理等关键方面打出政策“组合拳”,为青年提供精准有力支持;大学牵头搭建数字化学习平台,提供各类职业技能课

程资源与场景化实训系统,助力青年终身学习,以更好地应对产业快速迭代的挑战。

第三,“强参与”:校社联合开展常态化、多样化的政治文化活动与志愿服务活动,使青年在切身参与中增强社区归属感和融入度。青年友好型社区不仅应满足青年的基本生活需求,还要为青年的创新创业、学习交流、社会参与提供环境支持和条件,让青年在接受社区文化浸润的同时,以服务反哺社区建设,推动二者在更紧密的融合中实现价值共创。多样化大学可广泛对接社区、职能部门与社会组织,联合推出读书沙龙、就业创业指导、文体项目等特色活动,满足青年多层次发展需求。相应地,社区可基于大学的服务学习模式,定期开展涵盖养老服务、低碳建设等各类模块的志愿服务项目,组织青年根据各自专业特点参与不同类型的服务活动,鼓励青年将政治热情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将知识技能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例如研究型大学聚焦社区治理体系创新,带领青年基于社区难点问题开展专题调研活动与政策研究;应用型大学瞄准“智慧社区”建设,组织青年参与社区智能管理软件的研发应用与便民服务平台的搭建;技能型大学立足民生服务痛点,由青年发挥专业技能优势提供精准服务。

(二) 高校与城市共融:深化政产学研协同体系,推动高校与城市双向赋能

第一,高等教育要发挥龙头作用,不同类型大学根据城市建设的需求变化趋势,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现特色化、多样化、精准化的服务供给。大科学时代,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实际需求紧密相连,真正将需求侧的变化作为推动高等教育变革的动力已成为大势所趋^[35]。多样化大学在助力政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要明确树立“以特色发展融入城市、服务城市”的办学理念,即以开放的姿态面向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主战场,真正建立起教育规律与经济规律、教育发展与市场需求、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联系^[36]。同时,大学要立足自身办学定位,开展具有校本特色的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实践。在此办学导向下,大学要完善学科专业的设置调整机制,聚焦

城市建设重点领域并结合产业转型需求优化学科和专业布局,既加大对基础学科、新兴学科的投入与建设力度,又高度重视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与专业间的关联渗透。如区域内的应用型大学可围绕城市主导产业设置特色产业集群,以“订单式”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研究型大学可联合企业新增交叉学科,通过知识的重构与创新为新兴产业发展赋能。与此同时,大学要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努力为城市建设输送多类别、多层次的高素质人才。在培养目标方面,大学需突破培养学科型、知识型人才的单一目标,以产业多元需求为导向分门别类进行创新型、技能型、工匠型等多规格人才培养,确保人才具备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知识和技能^[37]。对此,大学要着力强化实践教学、实习实训等环节,通过校企合作及时将生产实践融入教学、将课堂搬进生产一线,并提升学生在真实情境下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此外,大学应通过数智技术手段,如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仿真等,赋能教育场景创新,提升学生的数智化综合素养与应变能力。

第二,青年发展型城市要发挥社会各主体的资源优势,推进政产学研协同机制与平台建设,反哺大学的多样化发展。政产学研合作是由政府、企业、大学及科研院所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渗透以及多向介入、优势互补而形成的动态开放系统,其资源传导方式主要依据资源的应用顺序在“政-产-学-研”间循环流转^[38]。基于此,各合作主体要在政府主导下发挥特色优势,共同深化政产学研协同体系建设,形成多元主体协同互动格局,为多样化大学服务青年发展型城市纵深发展赋能。在机制建设方面,政府要统筹优化不同类型大学、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城市空间布局,打造“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功能协同网络。同时,政府要加大对校企合作项目的资金投入与创新激励力度,建立并完善竞争性支持与稳定性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另外,政府需健全合作监督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及时调整各类创新要素的供给。在平台构建方面,可由政府搭台、企业支持、产教对接,多元主体与多样化大学共同构建多类型的

合作平台,发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作用^[39],高效衔接教育链、人才链与科技链、产业链。一是各类大学与企业共建人才交流平台,通过全面、真实且多元的信息共享消除人才流动的“信息差”,实现各类人才资源的有效配置。二是产学研联合打造技术攻关平台,邀请企业工程师和专家学者指导实践,大学教师参与企业项目研发,推动核心技术突破与人才培育的双向赋能。三是校企地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实现从科研立项、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与市场化运营的全流程项目管理,将大学的科技成果顺利转化为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服务动能。

(三) 城市资源共享:打造校城资源联动机制,激发青年创新创业活力

第一,校城加快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以具有共享性、开放性的物质空间重构打破学校与城市的边界。基于地理空间的邻近性,城市要集中布局多样化大学与不同类型企业并组成创新创业共同体。多样化大学要通过开放校园推动知识、技术资源外溢,与相关企业形成从基础研究到中试验证、再到产业孵化的一站式创新链,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例如地方应用型高校可与当地政府、产业园区、行业协会和企业等主体共同组建产业学院,各主体于其中整合多样资源、发挥多元功能,协作解决科研成果转化、青年创新创业等现实问题,实现资源的可持续融合发展。此外,城市可运用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为各类资源在校城间的顺畅流动打造数字化平台,便于青年创业者从中获取技术专利、市场分析等核心资源,降低试错成本。

第二,校城创新协同育人机制,以人才资源动态适配、精准匹配的社会空间重构打通青年和产业双向奔赴通道。多类型、高质量的人才供给是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开展良好互动的重要基础,这要求各类大学集聚社会资源,吸引行业企业全方位参与人才培养^[40],通过构建“横向资源协同+纵向资源衔接”的育人机制提高人才培养的适切性。横向,政府要整合多样化大学、企业、科研院所等主体资源形成协同网络;由企业提供真实研发课题,各类大学立足不

同功能定位开展理论研究或技术研发,科研院所开放中试平台,共同组织不同领域的青年以团队形式开展全流程创新实践。纵向上,校企应联合开设青年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的长学制项目,即大学开放教学体系并使之与科技创新发展及产业结构相结合,有机衔接校内理论学习与入企轮岗实训。另外,依托资源共享的数字化平台,产业利用大数据技术动态生成人力资源数据的可视化图表,为各大学优化专业设置、调整课程模块提供依据;青年运用 AI 算法寻找与自己适配的实习岗位与培训资源,实现青年人才的靶向培育与输送。

第三,校城携手涵育创新创业文化,以开放包容、价值共生的精神空间重构凝聚青年与城市的发展共识。承载相近价值观的使命和文化是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内驱力^[41],校城资源联动的可持续性依赖双方基于文化共识而形成的合作共赢的生态环境,即在促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与激发青年创新创业活力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因此,校城将协同培育创新创业文化作为切入点,打造支持青年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势在必行。一是多样化大学以资源开放为青年提供创新动能,即学校立足特色文化,在前沿理念的指导下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并将其有机融入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同时,大学积极与企业合作,开展“挑战杯”学术竞赛、创新创业文化周等多类型活动。二是企业以场景开放帮助青年在实践中实现价值跃迁,即运用技术、资金、市场及产业链等资源,为青年打造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使其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直观感受创新创业魅力。企业也可以组织优秀创业者与青年进行面对面交流,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三是社会其他主体通过文化浸润使青年树立对创新创业文化的认同,如新媒体平台广泛宣传青年创业者优秀事迹,地方政府开放博物馆、剧院等公共资源,以讲座、展览、话剧等形式传播创新创业文化,激发青年创新创业潜能。

(四) 激发社会共鸣:构建多元包容评价体系,助力青年融入开放型社会

第一,多样化大学要健全人才分类评价体

系,为青年开辟多元化、个性化的成长路径。大学的评价体系服务人才培养,应以人为核心,以人的价值为起点与旨归^[42]。为破解同质化评价导致的人才结构性失业困境,多样化大学要聚焦青年主体的成长与发展,依据学校的差异化定位将人才科学分类,在充分考虑不同人才成长规律与职责使命的基础上设置多元且适配的分类评价体系,让不同赛道的青年均能脱颖而出、在城市中更有作为。具体而言,研究型大学要聚焦学术型人才培养,打破“唯论文”的量化评价窠臼,强化对青年原始创新能力和学术质量的评价,推行多元主体评价机制。应用型大学要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旨,构建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市场评价深度参与的产教融合评价体系,重点考查青年的技术突破能力、成果转化实效与产业贡献。技能型大学要致力于为各行各业培养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高技能人才,围绕人才的专业技能水平、岗位胜任力以及职业精神等关键方面展开评价,并引入行业企业、第三方评价机构等多元化社会评价主体。

第二,政府应该打造包容性的制度环境,为青年提供容错的成长空间。青年发展型城市亟待打破“文凭至上”“学历歧视”的社会枷锁,引导社会各主体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为青年营造“试错-迭代”的包容性成长生态。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从根本上扭转“教育GDP”的政绩观,破除以分数、升学率、文凭等代替教育质量评价的做法,以立德树人为评价根本,深刻把握立德树人的科学内涵^[43]。从法律保障的角度出发,立法机关要通过修订现有法律或颁布新法律,对各类学历歧视现象予以明确列举、解释,并明令禁止各用人单位以“第一学历”或毕业院校层级作为人才招聘的筛选条件,以刚性的法律约束消解隐性的文凭壁垒。同时,政府要设置弹性政策,在引进人才时不以学历为唯一筛选标准,而是用多把尺子衡量参差多态的人才价值。此外,政府要创新容错的支持机制,建立“试错免责清单”,并运用创新保险、创业补偿基金等工具将青年试错成本社会化分摊,增强青年自由探索、大胆创新、积极创业的意愿,助力青年在社会中获得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

第三,社会要凝聚青年多元发展共识,为青年融入社会营造良好生态。事物之所以能形成共鸣,是因为它被嵌入到了体验和行动主体所面对的生活和世界的整体之中^[44]。在倡导多元、包容、自由的开放型社会中,各主体要从认知上打破文凭与能力的固化关联,在实践中将青年的所思、所想、所盼作为工作开展的落脚点,理性认知并包容接纳青年的多元价值。社会要建立健全涵盖品德、知识、能力、实绩和贡献等多要素的人才评价体系,让不同教育背景和职业岗位的青年达成共识,逐步将青年从同质化竞争的“内卷旋涡”中解放出来,让每个青年都在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个性化发展路径。与此同时,社会主流媒体要发挥媒介传播优势,重点宣传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和教育观,将“斜杠青年”“数字游民”等新兴职业形态纳入主流价值评价范畴,以媒体叙事重构社会对于“成功”的集体认知,消解“学历决定论”带来的社会焦虑。

参考文献

- [1] 郑刚,王菁.党领导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底蕴、理念遵循和优化路径[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106-112.
ZHENG G, WANG J.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conceptual principle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for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J]. 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5(1):106-112. (in Chinese)
- [2] 孙久文,蒋治.高质量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科学内涵与战略构想[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1-9.
SUN J W, JIANG Z.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strategic conception of constructing youth development city with high-quality [J].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2(6):1-9. (in Chinese)
- [3] 赵联飞.高质量发展视野下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3(10):48-54.
ZHAO L F.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youth development-oriented cities from the

- perspective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J]. China youth study, 2023(10):48 - 54. (in Chinese)
- [4] 王义遒.多样化: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关键[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4):17 - 22.
- WANG Y Q. Diversity: the key issue in Chinese mass higher education [J]. 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review, 2003(4):17 - 22. (in Chinese)
- [5] 邹晓平.高等学校的定位问题与分类框架[J].高教探索,2004(3):8 - 12.
- ZOU X P. Classification & issues of position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J]. Higher education exploration, 2004 (3): 8 - 12. (in Chinese)
- [6] 郑杰,兰金林,李梦婷.技能型社会建设视阈中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4):110 - 122.
- ZHENG J, LAN J L, LI M T. Research on diversif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 perspective from construction of skilled society[J].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s), 2024(4):110 - 122. (in Chinese)
- [7] 陈亮,邹洪森.数智时代大学多样化的多维阐释、运行机理与未来想象[J].南京社会科学,2024(8):129 - 141.
- CHEN L, ZOU H S.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future imagination of diversity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in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J].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4(8):129 - 141. (in Chinese)
- [8] 马陆亭,张伟,王绽蕊.高等教育如何支撑创新型城市发展——深圳案例与国际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22(6):21 - 27.
- MA L T, ZHANG W, WANG Z R. How higher education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cities[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22(6): 21 - 27. (in Chinese)
- [9] 阙明坤,王佳桐.协调发展视域下地方高校与城市共生发展研究——基于韩国地方高校与创新城市联动的分析[J].高校教育管理,2022(6):32 - 46.
- QUE M K, WANG J T. The symbiotic development of local universities and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linkage between local universities and innovation cities in South Korea [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2022(6):32 - 46. (in Chinese)
- [10] 方超.教育扩张政策与流动人口的教育收益率[J].重庆高教研究,2023(3):52 - 63.
- FANG C. The policy of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educational return rate of floating migrants[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3 (3): 52 - 63. (in Chinese)
- [11] 陈光亭,周良奎.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路径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4):124 - 130.
- CHEN G T, ZHOU L K.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excellent regional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of engineering, 2020(4):124 - 130. (in Chinese)
- [12] 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3.
- [13] 孙绍勇,李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新质生产力逻辑分析与路径探要[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24 - 131.
- SUN S Y, LI S. Logic analysi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under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J].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4(4):124 - 131. (in Chinese)
- [14] 韩继伟.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责任使命和路径选择[J].教育文化论坛,2024(4):37 - 44.
- HAN J W. The responsibility and path for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serv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J]. Tribune of education culture, 2024(4):37 - 44. (in Chinese)
- [15] KNIGHT J. Education hubs: a fad, a brand, an innovation? [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1(3):221 - 240.
- [16] AUDRETSCH D B, BELITSKI M. The role of R&D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in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20,123:1 - 24.
- [17] 邓智团.卓越城市创新街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4.
- [18] 陈亮,商一杰.新型研究型大学与城市互动的生态结构及协同机制设计——基于组织生态理论的视角[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24(6):90 - 100.
- CHEN L, SHANG Y J. The ecological structure and synergistic mechanism design of new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teracting with cit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ecology[J].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4(6):90 - 100. (in Chinese)
- [19] 史蒂文·科恩.可持续城市[M].郭栋,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83.
- [20] 阿尔伯特·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M].陈欣银,李伯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69.
- [21] 余利川,钱玉琴,陈小满.形式化“破五唯”的表征、逻辑与变革——基于460份“双一流”高校博士生学术评价文本的分析[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4):108 - 118.
- YU L C, QIAN Y Q, CHEN X M. The characteristics, logic and reforms of formalized "breaking the five-only": an analysis of 460 doctoral students, academic evaluation texts from the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J]. 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 edition), 2024(4):108 - 118. (in Chinese)
- [22] 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99.
- [23] 周宇香.中国青年人口规模与结构变化——基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2(7):40 - 47.
- ZHOU Y X. Changes in the size and structure of China's youth popul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previous census data[J]. China youth study, 2022 (7):40 - 47. (in Chinese)
- [24] 杨涵墨.中国人口老龄化新趋势及老年人口新特征[J].人口研究,2022(5):104 - 116.
- YANG H M. Dynamic trend of China's population ageing and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J]. Population research, 2022(5):104 - 116. (in Chinese)
- [25] 李飚,仇勇.人口老龄化与城市创新:理论逻辑与中国经验[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53 - 160.
- LI B, QIU Y. The population aging and urban innovation in China: its theoretical logic and Chinese experience[J].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4(1):153 - 160. (in Chinese)
- (in Chinese)
- [26] 兰德尔·柯林斯.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M].刘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13.
- [27] 谢影,朱新卓.能力遮蔽、文凭排斥和身份符号:“第一学历现象”的社会学审思[J].大学教育科学,2024(4):37 - 45.
- XIE Y, ZHU X Z. Capability obscuration, diploma exclusion, and identity symbolism: the soci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first degree phenomenon" [J]. University education science, 2024 (4):37 - 45. (in Chinese)
- [28]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8.
- [29] 李桂花,吴诗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与实践路径——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44 - 51.
- LI G H, WU S J. The focus and practical path of furthe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rou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depth study on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J].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4(3):44 - 51. (in Chinese)
- [30] 陈亮,孙谦.新型研究型大学赋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逻辑构架与行动路向[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64 - 76.
- CHEN L, SUN Q. The logical framework and action direction of new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empowering the mission of building a powerful 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J]. 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4 (4): 64 - 76. (in Chinese)
- [31] 刘振天,赵志强.趋同与分化:高校分类发展双轨体系的难题及破解[J].中国高教研究,2023(2):40 - 49.
- LIU Z T, ZHAO Z Q. Convergence and differentiatio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the double-track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develop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3(2):40 - 49. (in Chinese)
- [32] 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

- 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307.
- [33] 涂成林.大学科研服务社会的模式与机制研究[J].教育研究,2011(12):46-49.
TU C L. Research on the mode and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social service[J].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1 (12): 46 - 49. (in Chinese)
- [34] 许昊,华晨,李咏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老旧小区社会活力再生规划路径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22(3):96-101.
XU H, HUA C, LI Y H. Youth development in city building: planning for the regeneration of social vitality in the old community[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2(3):96 - 101. (in Chinese)
- [35] 邬大光,王星墨.解构与重构:大科学时代的高等教育体系[J].中国高教研究,2025(1):24-31.
WU D G, WANG X Z.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era of big science [J].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5(1):24 - 31. (in Chinese)
- [36] 华长慧.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J].教育研究,2013(6):52-58.
HUA C H. The function of service-oriented reg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e paths of implementation[J].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3 (6):52 - 58. (in Chinese)
- [37] 魏玉书,乔庆东.新质生产力视角下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J].现代教育管理,2024(12):11-19.
WEI Y S, QIAO Q D. 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cultivating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J]. Modern education management, 2024 (12):11 - 19. (in Chinese)
- [38] 李海萍,刘芳芳.从“倡导者”到“有效介入者”:论政产学研合作中的政府角色[J].教育发展研究,2024(17):41-50.
LI H P, LIU F F. From "advocator" to "effective intervener": o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J].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24(17):41 - 50. (in Chinese)
- [39] 刘晓,王烨清.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内涵、建设目标与推进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24(11):106-115.
LIU X, WANG Y Q.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goals and advancement path of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y [J]. Modern education management, 2024(11):106 - 115. (in Chinese)
- [40] 王晓茜,张珏.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意涵与实践进路[J].高校教育管理,2023(3):21-31.
WANG X X, ZHANG J.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2023 (3): 21 - 31. (in Chinese)
- [41] 史秋衡,周良奎.校城共同体: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与城市共生关系新范型[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2(4):128-134.
SHI Q H, ZHOU L K. University-city community: a new paradigm of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and cities [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of engineering, 2022(4):128 - 134. (in Chinese)
- [42] 姜新生,董惠仪.人机融合教育:内涵特质、应然取向及实践路径——基于教育复杂性视角的审视[J].教育文化论坛,2024(6):42-49.
JIANG X S, DONG H Y. Human-machine integrated education: values, proper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pathways: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complexity [J]. Tribune of education culture, 2024 (6):42 - 49. (in Chinese)
- [43] 王洪才,刘斯琪.论高质量高等教育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J].重庆高教研究,2024(5):3-13.
WANG H C, LIU S Q.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4(5):3 - 13. (in Chinese)
- [44] HARTMUT R. Resonance: a sociology of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M].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232.

(责任编辑 刘伦)

(下转第 94 页)

Empow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ducation powerhouse with Higher Education 5.0: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path

LAN Guoshuai, SONG Fan, XIAO Qi

(School of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global education systems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Higher Education 5.0, as a new paradigm integrat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with humanistic guidance, is emerging as a key driver in building world-class education systems.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5.0 i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educational paradigm that integrates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humanistic guidance. Policy empowerment, policy support,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have provided key impetus and systematic guarantee for the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becoming an education powerhouse.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Higher Education 5.0, China should build a human-oriented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 deepen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among industry, academia and research,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ducational digital ecosystem, strengthe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nd optimize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the three pillar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new quality education and new quality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enhance students' digital literacy and lifelong learning ability, and promote the joint efforts of multiple subjec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5.0, thereby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promoting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er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ducation powerhouse.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an education powerhouse; Higher Education 5.0;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China's path

(上接第 70 页)

Interactive scenes,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university diversified empowerment youth development city construction

CHEN Liang, LIU Yixuan, WANG Yankai

(Faculty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university diversification development and youth development-oriented city construction is a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space-function-emotion" with "sustainable innovation ecosystem" as the value core, which is rooted in the symbiotic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production, resource circulation and value co-creation. This coupling relationship relies on the interaction of university, city and youth to form a four-dimensional spiral progressive system of professional ability, urban identity, innovation concentration and cultural temperature, and forms a city-university interaction picture of knowledge hub, innovation hub and talent hub under the bonding effect of field culture. However, in the era of rapid social change,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diversified university development and youth development city is facing the reality impact of population loss crisis, diploma worship, resource sharing barrier and weak urban transformation. It is urgent to meet the future challenges with high-quality interaction of "university-youth-city".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versified university development enabling youth development city needs to build a symbiosis mechanism between people and cities based on youth-friendly ecolog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chools and cities by relying on the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promote the sharing of urban resources for yout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needs, and shape social resonance with a multi-inclusive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university diversification development; youth development city; city-university symbiosis;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